NO. 51 2018 SPRING / SUMMER

第五十一期
二〇一八年 ■ 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香港研究：健康與生活

▲ 宏觀因素、社會信任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

▲ 香港中醫就診趨勢回顧

▲ 人生意義對華人長者生活質素的影響

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

「一帶一路」的挑戰

▲ 馬來西亞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槓桿

▲ 臺灣四大報的亞投行新聞報導

亞洲研究

▲ 何炳棣與中研院斷交考

書評

▲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　2018 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1　Spring / Summer 2018

大中華研究中心
Centre for Greater China Studies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 2018 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1 Spring/Summer 2018

國家利益之新聞框架
以臺灣四大報的亞投行新聞報導為例

News Framing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e news representation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the four Taiwan newspapers

林顯明 *
Hsien-Ming Lin

摘要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為中國大陸主導和倡議的跨洲際國際金融機構，臺灣是否加入成為各界所關注的焦點。本文運用內容分析法，研究發現臺灣四大報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框架和再現策略與過去四大報報導兩岸關係相關議題之報導方式類似。臺灣四大報在報導兩岸議題時，新聞媒體似乎一直存在着國家利益之理性與感性觀點的拉扯，對此本文提出可從共享人類文明的觀點出發，藉以突破當前論述的困境，並尋找出更符合中華民國（臺灣）國家利益的觀點和策略。

---

* 林顯明　比利時魯汶大學跨文化、遷徙與少數族群研究中心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生；臺灣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收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接納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關鍵字

一帶一路、內容分析法、亞投行、兩岸關係、新聞框架

Abstract

China initiated a new regional bank institution calle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in 2014. Whether Taiwan joins the bank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This issue is a good case to investigate how the Taiwan media reports this event and what framing strategies the Taiwan media employs in the news. The newspapers in Taiwan are found to displa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or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news contents, news resources, attitudes of news and news framing. The news discourses in Taiwan have faced the conflicts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and emotional feeling. To break through these paradoxical phenomena,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aiwan should construct the new national interests' dis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determine appropriate national interest discourses and gain further benefits from the change in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litics.

Keyword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ross Strait Relations, News Fram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設立

隨着中國大陸政經綜合實力的增加，中國大陸之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已於 2010 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應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崛

起，其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亦逐漸地從過去的「韜光養晦」轉變成「有所作為」之政策方針。其中習近平所擘劃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倡議更可以顯現出中國大陸當前在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之戰略佈局。

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訪問哈薩克，首次倡議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另外，習近平於 2013 年 10 月 3 日訪問印尼時，再提出願意與東南亞各國共同建立 21 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中的一帶所指的就是中國大陸欲恢復過去中國歷史上與中亞和西亞國家進行絲綢貿易的路線，並進一步擴大至歐洲的阿姆斯特丹；從地圖上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西安出發，沿途經過蘭州、烏魯木齊、哈薩克阿拉木圖、吉爾吉斯比斯凱克、烏茲別克薩馬爾罕、伊朗德黑蘭、土耳其伊斯坦堡、俄羅斯莫斯科再經德國杜伊斯堡最後到達荷蘭鹿特丹。

一路的重點則放在海上戰略之推廣，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泉州出發，經廣州、海口、馬來西亞吉隆坡、印度加爾各答後，橫越印度洋到達東非奈洛比再通過地中海到達希臘雅典、意大利威尼斯，最後終點一樣來到荷蘭鹿特丹。一帶一路共計通過 64 個國家，人口總數高達 44 億、經濟規模達 21 兆美元，約佔全球經濟比重之三成，而一帶一路計劃之總投資規模超過 50 兆新臺幣。一帶一路倡議將積極與沿線國家進行合作，並將相關投資計劃着重於基礎建設之投入，包括與沿線國家合作進行港口、鐵路、油氣管、交通物流、基礎電力系統等建設之推展，希冀促進沿線國家與中國大陸之旅遊、商業貿易、金融發展與農產品貿易等互動與交流（邱素津、趙永祥，2016）。

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積極開發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其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宣佈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其運作模式則是透過債權融資的方式，提供亞洲國家在推動基礎建設時之資金需求所用；另外與同樣着重支持第三世界基礎設施投資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不同的是，亞投行的扶貧功能相對淡化，並最大限度地支援亞洲國家基礎設施之建設。面對中國大陸所主導和成立的亞投行，臺灣是否應該要加入，成為一個在臺灣社會內部充滿爭議性的議題。媒體民調顯示，若中國大陸未在臺灣申請加入亞投行之申請案上，給予臺灣不平等之對待或在名稱矮化臺灣的情況下，有 75% 的民眾認為臺灣應該爭取成為亞投行之會員國；但若中國大陸在名稱上要求臺灣需以「中國臺灣」或「中國台北」的名稱才能加入的話，有約 60% 的民眾則認為不應該在名稱被矮化的情況下加入亞投行（臺灣指標民調，2015）。另外，不僅臺灣社會對於是否應加入由中國大陸所主導之區域金融制度有着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當時馬英九政府對於是否要提交入會申請書給亞投行的立場也一直呈現猶豫不決的情況。臺灣直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遞交成為創始成員國截止時間的最後五個小時，才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請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向亞投行籌備秘書處遞交入會申請書，藉此希望臺灣成為亞投行第一波之創始成員國。然而，2015 年 4 月 15 日國台辦記者會上，發言人馬曉光表示臺灣並不在第一波創始成員國之名單中，但依舊聲稱：「我們對臺灣方面以適當名義參與亞投行持歡迎態度。」從國台辦的記者會可知，臺灣並未如願地成為第一波創始成員國，而兩岸也未能在臺灣以何種名義加入亞投行之問題上取得共識。截至目前為止，臺灣是否能加入亞投行以及要用甚麼樣的名義加入等問題，兩岸皆尚未有進一步取得共識的跡象（中央社，2015）。

面對臺灣社會內部對於此議題之分歧立場及兩岸政府對於名稱上的各自堅持，媒體如何報導這一個具有高度爭議的議

題，成為影響閱聽人（audience）對於該議題立場之重要因素。對此，本研究欲觀察媒體是如何在新聞報導中再現亞投行議題、媒體採用了甚麼樣的報導框架、報導內容中誰擁有發言權等面向進行探討。

二　理論架構：框架理論的觀點

Goffman & Berger 運用框架（framing）的概念，來說明人們是如何解釋與處理日常生活中眾多之訊息與社會真實建構的機制與過程。在吾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式各樣對於真實世界的訊息，而吾人該如何看待如此紛雜的訊息，則必須仰賴奠基於每個人各自發展出來的認知框架來加以判斷。換言之，框架在人們處理眾多訊息的過程中扮演着轉換（transformation）社會真實現象成為個人主觀認知的功能；換句話說，框架即是人們處理訊息與理解真實世界的一套轉化機制，也是人們解釋外在真實世界成為個人主觀認知的基礎（Goffman & Berger, 1986, pp.10-21）。框架的運作機制包括選擇、強調與排除等作用，框架機制使吾人選擇了特定的認知模式來解釋不一樣的社會真實資訊，而人們也受到本身主觀框架的影響而進一步地選擇其所認同的資訊加以放大或強調，當然這個過程中也包含了某一些資訊或社會真實被刻意排除的主觀選擇。由此可知，框架機制的運作過程，即是個人在資訊選擇與排除上的一種權力表現（Entman, 1993）。框架效果對於個人而言不僅是提供人們轉換社會真實訊息看法之機制，相反地，個人之認知框架形構，亦有可能反過來成為人們解釋世界的一種界線與限制。當吾人已習慣於使用既有之認知框架來看待真實世界之資訊時，人們可能會忽略了既有框架以外之資訊，進而成為人們對於事件的特定意識形態、刻板印象或偏見，即為框架效果之負面展

現（臧國仁，1999）。

另外，認知框架在形塑的過程中，亦會受到其他社會行動者的影響，其中大眾傳播媒介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每天，社會上都有各式各樣的社會事件正在發生，但甚麼樣的社會真實事件可以獲得新聞媒體的青睞進而加以採訪並報導呢？對此，從新聞產製的過程來看，新聞媒體負責編輯台內的新聞，編輯即扮演着從社會真實事件與新聞播出過程中守門員（gate keepers）的角色。要受到編輯台中新聞編輯所青睞的社會事件，才會驅使新聞媒體運用其資源進行採訪和播出，從這個角度來看，由於新聞產製的過程已經由守門員把關，因此吾人從媒體所接受到的新聞內容，早已是經過層層把關下最後產製的結果。而新聞編輯台的守門員，亦很大程度地決定了吾人可以接收到哪些新聞內容，以及哪些新聞內容是值得被播出的；因此，新聞媒體對於閱聽人而言，具有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效果，其決定了吾人可以接收到哪些訊息，以及哪一些訊息被排除在閱聽人可以接收的範圍之外（陳敦源、呂季蓉、孫玟秀，2014：頁 9-11）。由於新聞媒體擁有選擇報導哪些議題以及不報導哪些議題的權力，其議題設定的能力也就因此進一步地影響了閱聽人對於社會真實建構（construct social reality）的結果。

Adoni & Mane 在針對媒體如何建構社會真實之研究時，歸納出真實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指經驗世界中所發生之真實事件；第二種是符號真實（symbolic reality），指從媒介傳播者文本或新聞報導中所呈現之社會真實；由於閱聽人對於社會真實之訊息來源很大部分來自於媒體傳播而來，但由於媒體在進行新聞報導與再現社會真實的過程中，並非一成不變地進行社會真實的呈現，而是受到媒體本身之立場與框架所影響，因此當閱聽人接收到由新聞

媒體所呈現之符號真實後，也有可能產生許多不同的詮釋，並形成第三種之個人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因此社會真實之轉換與詮釋，是一種來回於社會、媒體與個體之間，由外而內及由內而外相互影響與建構的持續過程。Bryant & Miron 認為媒體框架效果會影響閱聽人對於社會事件真實認知的形成，亦能引導人們對於何謂真實、以及如何對於真實之感知與再現過程產生影響。換言之，媒體框架不僅能影響個人對於特定事物的看法，亦能影響人們對於事件之價值判斷（Bryant & Miron, 2004）。對此，新聞媒體可運用特定之文字來針對其所報導的新聞事件進行描述，例如重複地使用具有某種特定立場與隱喻意涵的文字來進行新聞報導，則其所再現的就不僅僅是社會真實，而是奠基在媒體經由守門員把關、經營與收視思考和媒體所具有之特定立場等條件考量下，所反映的媒介真實，因此媒體的新聞報導是一種事實的再現，且此再現的內涵包含着媒體所欲傳遞的框架與立場，而並非僅是真實地反映與呈現社會之真實現象。

Iyengar 發現新聞媒體在報導時所使用的不同框架策略，會進一步地影響到閱聽人對於社會責任（societal responsibility）歸屬之判斷。當媒體報導所使用的是主題式框架（thematic framing）時，這種新聞報導方式主要是以聚焦在整體社會層面或政府層級的方式進行報導與論述，此時閱聽人要進一步地針對責任歸屬進行判斷時，亦較容易將事件責任歸咎於社會整體或政府的施政不當所致。相反地，若媒體報導所使用的是情節式框架（episodic terms）時，媒體的報導方式會較聚焦於個人層次上事件情節的描述與說明，因此當閱聽人欲判斷責任歸屬時，就較容易將事件責任歸咎於個人行為所致（Iyengar, 2005）。另外，An & Gower 進一步將媒體框架之責任歸屬概念運用在不同類型之危機（crisis）新聞之探討上，若新聞危機事

件起因於意外（accidental），閱聽人較傾向將事件責任歸屬於組織和社會層次；若危機事件起因於可避免（preventable）而未避免之境況時，閱聽人則較容易將責任歸屬於個人因素（An & Gower, 2009）。雖然，閱聽人在閱讀新聞文本時，擁有自主詮釋與判斷新聞內容的能力，但閱聽人在時間與能力的限制下，不太可能針對每一則新聞內容進行深入的思考與判斷，此時媒體報導的使用策略就會對於閱聽人產生重要的影響。Boukes, Boomgaarden., Moorman & Vreese 的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在針對複雜的事件進行報導時，若媒體同時提出客觀的統計數據及事件相關當事人（personal exemplars）的訪問，閱聽人在時間與能力受限的情況下，較容易相信人物訪問所呈現的觀點，並據此做出事件責任歸屬之判斷，亦較傾向將事件之責任歸屬於社會整體或政府層級（Boukes, Boomgaarden., Moorman & Vreese, 2015）。

綜合上述討論，框架效果的運作機制，同時存在於個人對於事件認知轉換的過程，以及媒體報導對於閱聽人認知之影響兩個面向。因此，新聞媒體如何針對新聞事件進行報導，就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閱聽人框架效果與認知機制之運作結果。媒體在報導新聞時，不僅擁有能影響閱聽人對於哪些議題值得被關注之議題設定能力，也可進一步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內容影響閱聽人進行議題思考之框架能力（framing effect）。尤有甚者，當閱聽人已從媒體上獲知某社會事件後，會與接下來觀察到的現象產生潛意識的連結，亦即以前所接收到的訊息內容，將會對新訊息與事件造成影響，此即為媒體在框架效果下對於閱聽人更進一步產生之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Scheufele & Tewksbury, 2007），順此可知，媒體新聞報導的方式與框架策略的運用，會對人們認知框架之機制與責任歸因產生重要的影響。

三　兩岸關係議題的媒體再現及「理性」與「感性」觀點之拉扯

1　兩岸關係議題的媒體再現

張錦華（2012）分析臺灣四大報報導中國大陸省市採購團的新聞內容與報導框架發現，《中國時報》報導相關新聞的篇數最多，且在報導立場上有超過九成皆是以正面方式進行報導，報導次多的則為《聯合報》，其報導立場亦有超過九成是以正面的方式進行報導。《蘋果日報》在報導數量上則最少，但報導立場上亦皆以正面方式進行報導。另外，《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在報導相關省市採購團之新聞時，接受了來自中國大陸省市採購團所置入的媒體報導框架，並多以情感、道德和權力層面的框架和正向的立場進行報導。《蘋果日報》的部分，雖然其也多是以正面的方式進行報導，但由於其報導篇數少，且多半多是針對較為瑣碎的採購團行程進行報導，因此其情感、道德與權力的報導框架並不明顯。至於《自由時報》則並未針對中國大陸之省市採購團進行報導，若有相關之新聞置入或評論意見時，也都以負面方式進行書寫，對此該文認為《自由時報》似乎是有意識地拒絕中國主導的採購團議題，符合該報一向較為反中的立場。林顯明（2015）運用文字探勘（text-mining）的方式，分析臺灣四大報報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新聞內容，透過文字切詞軟體的運用來探究不同報紙針對 ECFA 議題主要之報導議題與立場差異。該文研究發現，《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報導策略類似，在報導 ECFA 議題時關注的議題大多為「政治類」與「經貿類」之相關議題，相反地並不太關注「社會類」關鍵詞之議題；在報導立場方面，《中國時報》正向形容詞的使用頻率高出負向形容詞使用頻率 2 倍，而《聯合報》正向形容詞的使用頻率則高於負

向形容詞的 1.88 倍。因此，總體而言，《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所採取的是「正向報導、缺乏社會議題連結性的弱監督性」的報導策略。《自由時報》方面，其報導內容雖然包括了「政治類」、「經貿類」與「社會類」關鍵詞等議題，但由於其報導立場皆是以負面方式進行報導，因此雖然在報導主題和內容上較為多元，但立場的單一亦可能使得閱聽人僅能接收到單方面資訊的限制。至於《蘋果日報》方面，由於 ECFA 議題並非其所特別着重關注的新聞報導內容，因此在報導篇數上並不多，但總體而言其報導之正、負面立場比例差距不大，報導語言較為中性且報導引用來源也較其他三報來得多元。

王毓莉（2005）以《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為例，比較這兩家中國大陸的媒體是如何進行臺灣議題的報導。該文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媒體在進行臺灣議題報導時，常會透過新聞篩選，並選擇負面事實作為報導重點。例如中國大陸媒體對於臺灣新聞報導重點偏向以經濟新聞居多，在內容上則多以陳述臺灣失業率上升、經濟成長衰退、整體經濟不景氣等，藉此給予讀者負面印象。另外，該文研究也發現，中國大陸媒體除了着重報導經濟議題外，報導臺灣在地故事的人情趣味型內容亦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報導重點，但在這些人情趣味的報導內容中，中國大陸媒體會藉由這些軟性的議題，藉以訴求兩岸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並凸顯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情感聯繫。楊慧娟（2010）分析《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報導中國大陸富豪團來臺行程之內容與差異時，發現《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富豪團的描述較為正面，且《中國時報》主張應該給予陸資和外資一致的待遇，不應該對陸資施以不公平的規範和對待；《自由時報》則着重於報導陸資對於臺灣經濟與社會可能產生的風險與衝擊，並將部分陸資投資和購買房地產的訊息視為富豪炒樓團。由於兩岸關係之複雜性與特殊性，臺灣

與中國大陸媒體在報導兩岸相關新聞時，時常展現出各自對於認同和國家利益分歧之立場和看法。對此，石之瑜認為在兩岸的特殊關係下，兩岸的新聞媒體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都考量到兩岸在國際社會正當性的競爭，因此在進行有關國家利益之新聞報導時，常是延續着現實主義之國家利益觀點進行報導。新聞媒體成為了肯認這種具有理性和單一判準的國家利益觀點，這樣的新聞報導內容，忽視了少數族群、婦女、兒童、勞工等不同觀點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立場。而這種基於兩岸主權競爭觀點下的新聞報導內容，無形中加大且分化了兩岸在主權和政治立場上的不同，忽略對兩岸人民共通性的報導，對於協助減緩和解決兩岸關係問題無法提供幫助（石之瑜，1994）。

2 兩岸關係中「理性」與「感性」觀點之拉扯

然而，臺灣社會以及媒體在報導兩岸關係相關新聞觀點上的差異，可進一步地以「理性」與「感性」兩種觀點加以理解。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和媒體在面對中國大陸之議題時，時常陷入在「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兩種觀點的拉扯中；理性自利的觀點是奠基在經濟學對於理性人的假設而來，在經濟學的觀點中，人們皆是理性且自利的，人們會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經濟的理性計算，在個體有意識的情況下，追求個人成本的最小化以及自我利益的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對此，Sears and Funk 認為一個理性自利的經濟人在其社會生活中將以自利行為為導向，着重中短期利益的計算，並以追求物質性和個人之利益為主要目標。在理解兩岸關係議題時，與理性自利不同觀點的即是「感性認同」，不同於理性自利觀點強調理性效益之計算以及對於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感性認同的觀點認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並非全然理性，在很多層面上人們的社會

生活與政治行動會受到情感與感性思維所影響。事實上，人們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環境是多變且複雜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個別的行動者並沒有能力可以改變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大環境，因此人們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將會積極地尋找可供其依附之感性標的，如政治領袖、象徵符號與政治論述等，透過依附於各種不同之政治象徵符號，一方面協助人們簡化複雜的真實世界，另一方面提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認同、依附和歸屬感（Sears, 1993, pp.120-125）。

對此，許多研究者即運用「理性」與「感性」的觀點和分析架構，來解析與兩岸關係有關之眾多議題。吳乃德（2005）以麵包和愛情作為比喻，將麵包比喻成理性之經濟利益，而愛情則為感性之認同歸屬作為該文分析臺灣民眾民族認同變遷之分析架構。該文認為感性認同在形塑臺灣民眾之身份認同上比理性自利觀點的影響力來得大，因此即便隨着中國大陸的崛起可能為個人帶來較大經濟利益，但多數的臺灣人還是以其自身之社會化經驗和認同象徵標的物作為決定其身份認同的判別標準，使得歷年來針對臺灣民眾民族認同之相關調查結果皆顯示，臺灣民眾之臺灣人民族認同穩定地高過對於中國人身分之民族認同。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的研究則將理性與感性的分析架構，進一步地運用在分析臺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關係互動之立場與態度的研究中。該文研究發現，臺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態度看似是一個理性計算的問題，但事實上這樣的理性計算是奠基在臺灣民眾對於臺灣意識和臺灣人認同之條件上所進行。換句話說，臺灣民眾在計算兩岸經貿關係是否對於擴大個人之理性效益與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時，其判別標準是受到更深層之認同因素所影響。耿曙（2009）延續着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分析觀點，檢視從胡錦濤主席開始之惠臺政策是否進一步地影響或改變了臺灣民眾之

政治立場、政黨認同和身份認同等議題。該文研究發現，隨着胡錦濤時期多項惠臺政策的出台與施行，確實改善了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印象，使得有較多的臺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相關之議題上採取較為正面的態度。但有趣的是，該文研究發現對於中國大陸印象的改善，並未進一步地改變臺灣民眾之政治立場與身份認同。該文表示，許多臺灣民眾在檢視由中國大陸所提出之惠臺政策或兩岸經貿關係議題之立場時，是從「與對手貿易」（trading with the enemy）的觀點切入，換句話說，理性自利之經濟效益計算並非臺灣民眾在檢視相關議題時之唯一考量，相反地，「敵我意識」之感性認同才是影響臺灣民眾對於惠臺政策和兩岸經貿議題之關鍵判別標準。陳映男、耿曙、陳陸輝（2015）從國家與社會整體性之大我、以及個體利益之小我作為分析架構，藉以了解當臺灣民眾在面對和判斷兩岸經貿關係之立場是大我較為重要、還是小我的影響力較強時，該文研究發現，臺灣民眾在判斷兩岸經貿關係之利益時，同時受到整體大我與個體小我之利益判準所影響。但整體而言，臺灣民眾在權衡與計算兩岸經貿關係所可能帶來之利益時，整體大我的影響力大於個體小我之理性自利計算。然而，此種整體大我之利益計算並非是全然地理性與客觀中立的，相反地，臺灣民眾在進行整體大我之利益計算時，常被民眾個人之政黨認同以及其個人對於中國大陸之印象和喜好所影響。由此可知，臺灣民眾在面對如兩岸關係或經貿互動等宏觀之政治事件時，其立場與判別標準時常會受到媒體引導、政治論述、個人詮釋，甚至是個人好惡與其他自身認同等因素所影響。

尤有甚者，曾于蓁（2015）將上述之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分析架構實際地運用在分析中國大陸惠臺政策具體的地方實踐案例上。該文以中國大陸在臺灣臺南學甲地區所進行的「虱目魚契作」惠臺政策為例，探討臺南學甲地區之虱目魚養殖漁

民在與中國大陸合作契作養魚的情況下，是否進一步地改變了該地區民眾對於中國大陸之印象，乃至於進一步地影響到民眾的投票行為和政治立場。該文以 2012 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為例，檢視學甲地區之投票行為是否有所改變。該文研究發現，雖然臺南學甲地區養殖虱目魚之漁民接受了來自中國大陸之契作訂單，但其在 2012 年總統大選的投票行為並未因此就投給了北京當局比較喜歡或屬意的人選。雖然，從總統大選之投票行為來看，契作等相關的經濟惠臺措施並未顯著地改變臺南學甲地區民眾之投票行為，但透過契作政策的執行，已產生以下三項重要的政策效果：累積信任化解敵意、增加漁民收入穩定市場價格、以及建立在臺基層社會對中國大陸態度友善之利益聯盟。對此，該文雖然認為中國大陸之虱目魚契作政策並未對於臺南學甲地區民眾之投票行為和政黨立場方面產生立即性的影響，但該文也提醒，若中國大陸持續地對臺灣社會提供各式之惠臺政策，將可能會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從長期來看，透過經濟惠臺措施的實施進一步改變臺灣民眾之認同與投票行為並非不可能。Keng, Tseng & Yu（2017）針對臺南學甲地區所做的進一步研究顯示，當中國大陸的惠臺措施能夠確實到位，且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能夠被基層民眾所共享時，臺灣基層民眾對於中國大陸之正面觀感也將因此而被建立。對此，在惠臺政策利益到位且民眾對中國大陸正面觀感增加的先決條件下，該文認為中國大陸虱目魚契作之惠臺政策措施確實已逐漸地展現「潛移默化」的效果，並漸漸地改變臺南學甲地區民眾之政治認同與投票行為。事實上，上述這種理性與感性之間的拉扯，並不只存在於臺灣民眾之個人身上；相反地，理性與感性間的拉扯亦存在於中華民國（臺灣）對中國大陸之政策擬定上。Wei & Lai（2017）檢視了臺灣方面對中國大陸之政策後發現，臺灣的中國大陸政策並非僅是奠基在理性效益的計算

之上，相反地，臺灣的中國大陸政策亦同時受到感性認同的影響。該文指出，即便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能力上之崛起已經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太容易改變的背景條件，但臺灣方面的中國大陸政策並未因此就僅以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之單一觀點進行思考；相反地，臺灣方面之中國大陸政策一直以來皆是同時搖擺在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思維上，使得臺灣的中國大陸政策在不同的時期出現鬆、緊、鬆、緊的變化情形。另外，林顯明（2017）針對九二共識制度化過程的研究也發現，推動九二共識從一個兩岸關係中的新名詞，逐漸地制度化成為兩岸關係之關鍵詞彙的過程中，政治行動者透過不同政治論述策略的使用，包裝了在九二共識下的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思維。透過政治菁英之政治論述傳播，逐漸地將九二共識中所代表的利益與身份認同概念制度化成為當前兩岸關係中重要的政治論述和政策話語。

由上述討論可知，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思維軸線，不僅深刻地影響到臺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各種議題的看法與立場，亦對於臺灣政府在擬定中國大陸政策時產生影響。另外，從上述之研究可知，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並非兩個相互獨立的變項；相反地，理性自利的基礎會受到感性認同的影響，而感性認同亦會受到個人是否能夠獲得經濟上之理性計算所影響。順此，理性與感性似乎已成為了臺灣民眾、社會以及政府在思考和擘劃兩岸關係和中國大陸政策時之基礎思維，然而理性與感性一體兩面的特質亦具體地主導了當前臺灣社會與政治論述的思維軸線。若將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思考脈絡實際地運用在新聞媒體之報導與內容再現之思考時可知，若一媒體在進行有關兩岸關係議題之報導所採取的是理性自利之報導框架時，其新聞報導內容將會着重在此一新聞事件對於閱聽人和社會大眾所可能帶來之短中期物質與經濟利益；相反地，若一媒體在報

導兩岸關係相關議題所採取的是感性認同之再現策略時，其新聞報導內容將會更加地着重在此一新聞事件對於個人或整體社會之情感與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順此，從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思維角度出發，本文欲了解臺灣新聞媒體在進行亞投行新聞報導時，是否依舊持續地延續着這樣的論述和思維觀點；以及不同的新聞報紙在報導此一議題時，使用了甚麼樣的報導框架與論述內容。由於亞投行是中國大陸所主導和發起之跨洲際國際金融組織，而臺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對此媒體針對此一事件的報導，成為了吾人了解臺灣新聞媒體對於該議題之不同報導立場與內容框架的重要案例。

四　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

1　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本研究以新聞框架理論概念為基礎，探討亞投行議題在媒體再現下的報導主題（what）與主要言說者（who）等面向，並藉由分析媒體所呈現的框架類型與彼此報導內容進行對照，藉以探求臺灣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新聞時，其是否具有新聞再現上的框架差別。對此，以下為本文具體之研究問題：

臺灣四大報再現亞投行新聞主題與立場為何，彼此報導內容是否有差異？

臺灣四大報再現亞投行新聞時着重哪些人的觀點，在消息來源的引用上彼此是否有差異？

臺灣四大報再現亞投行新聞時之報導框架為何，在新聞報導框架上彼此是否有差異？而四大報所反映出來的報導框架，又與臺灣當前社會氛圍和兩岸關係發展脈絡產生甚麼樣的互動

關係？

臺灣四大報再現亞投行之新聞時是否延續着既有之「理性自利」和「感性認同」之兩線思維模式呢？

面對長久以來臺灣社會擺盪於「理性自利」和「感性認同」之思維困境，吾人是否有機會開拓出第三種不同的論述內涵和思維的可能呢？

2 研究設計

本文使用慧科新聞資料庫（WiseNews）作為資料蒐集之來源，下載在標題有出現關鍵字「亞投行」的相關新聞報導，下載完成後本文採用量化內容分析法（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藉此了解臺灣四大報新聞媒體再現「亞投行」議題時之相關議題。內容分析法部分，將針對新聞內容的報導主題、消息來源、新聞報導立場和新聞報導框架等進行編碼（coding），希冀能協助吾人了解亞投行議題是如何被臺灣四大報新聞媒體所報導，及其所再現的新聞框架為何，以及在這些框架下所展現出來不同新聞媒體所欲建構的國家利益觀點。

2.1 分析單位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從新聞資料庫下載而來的每一「則」新聞內容，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探討的內容，以及研究者透過閱讀所有的新聞文本所歸納出的報導主題與報導內容，作為本文建立分析類目與框架時之依據。換句話說，本文先是透過歸納法，將所蒐集來的新聞內容進行主題、類目與框架的分類，並在此基礎上運用演繹之內容分析法，探究臺灣四大報紙媒體在報導亞投行議題時是否有差異。在樣本選擇上，本文根據 2015 年臺灣媒體白皮書的調查，當前臺灣閱讀量超過 1% 的綜

合性報導依序為《自由時報》，其閱讀率為 14%、《蘋果日報》閱讀率為 13.5%、《聯合報》5.5% 及《中國時報》3.8%（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15）。因此，本文所分析的新聞樣本來源即自於上述四大報之報導內容。

2.2 編碼與信度檢測

如上所述，由於亞投行成立之備忘錄簽署時間為 2014 年 10 月，因此本文在樣本時間的選取方面，蒐集了臺灣四大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從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新聞標題中有出現「亞投行」之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本研究共下載了新聞報導 381 則。另一方面，編碼過程有兩位編碼員與研究者共同進行，兩位編碼員皆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編碼員皆修習過社會科學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對於編碼過程和內容分析法之實際應用與操作並不陌生。在進入到正式編碼前，研究者先隨機地從所有新聞文本中抽樣出一成的新聞（40 則）藉以檢驗編碼者對於編碼簿（coding book）和類目建構是否達到內容分析法之同意度和信度（reliability）標準。本文兩位編碼員之相互同意度方面達 0.81，信度檢驗平均為 0.95，達到內容分析法所要求的標準 0.80 以上（王石番，1991）。

2.3 類目建構

本研究所進行之內容分析類目建構類型說明如下：

新聞報導內容與主題

有關於新聞報導的內容與主題類目建構方面，本文參考劉

嘉薇（2017）、林顯明（2015）及陳祥、陳嘉珮（2009）針對兩岸關係議題所彙整之新聞報導內容項目，並輔以研究者逐一閱讀每一篇新聞報導內容後，將亞投行之新聞報導主題分成以下幾種：

1. 國家主權議題：當新聞報導內容中出現針對兩岸關係之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之報導與討論時，即可將其報導主題歸類為主權議題。其具體可能會出現或使用的報導文字包括：統一、獨立、維持現狀、一個中國、一中一臺、兩國論、一中各表、一個中國、臺灣國、中華臺北等涉及國家主權議題之討論。

2. 國家安全議題：本文所界定的國家安全議題，主要是針對軍事安全議題之討論。若新聞報導中出現國軍、共軍、武力犯臺、美國協防臺灣、網軍等關鍵詞之新聞報導內容，則將該則新聞內容主題歸類為國家安全議題。

3. 經濟貿易議題：亞投行的設立不僅是中國大陸首次組織之跨洲際金融機構，因此針對該項議題所進行之新聞報導應會觸及許多經濟和貿易相關之內容。對此，若新聞報導中出現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性協議、FTA、自由貿易協定、區域經濟整合、TPP、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臺商（臺資企業）、陸資或中資企業、陸客來臺、陸客觀光等報導內容，則將該則新聞內容主題歸類為經濟貿易議題類目。

4. 民主政治議題：若針對亞投行之新聞報導內容以探討民主價值、民主化、人權、選舉、自由、公投、政黨、政黨輪替等議題為主時，則將該則新聞歸類為民主政治議題類目。

5. 文化交流議題：由於亞投行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計劃下所倡議設立的金融機構，因此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無論是一帶一路或是亞投行，不僅具有政治與經濟意涵，中國大陸亦希望透過一帶一路計劃的規劃重拾古代路上絲路與海上絲路的

文化意涵。因此，若新聞報導主要的內容與中國文化、古代絲路、共同記憶、中國歷史等議題時，即將該則新聞歸類為文化交流議題。

6. 國際關係議題：由於亞投行吸引了跨洲際的國家參與，因此在相關新聞報導的內容中，亦會涉及許多國際關係之議題。因此當新聞報導的內容主要是在探討外交、美國、日本、歐盟、韓國、東協、國際組織、聯合國等和各國相關之國際關係內容探討時，即將該則新聞歸納至國際關係議題類目。

7. 社會民生議題：若新聞報導內容主要是在探討臺灣內部之社會民生議題包括貧富差距、薪資停滯、社會不公、生活品質、食品安全、勞動條件、生活物價、就業市場、醫療保健時，即將該則新聞納入社會民生議題類目。

8. 其他主題議題：若該則新聞內容無法有效地被納入至上述之議題類目分類架構中，則將該則新聞納入至其他主題之分類目中。

新聞報導消息來源

本文依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1）針對兩岸關係與相關政策新聞來源類目為基礎，並加上研究者閱讀所有亞投行之新聞報導內容後，將新聞報導來源分為以下幾類：

1. 臺灣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行政機關、官員、中央與地方民意代表等。

2. 中國大陸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行政機關、官員、國營事業官員。

3. 臺灣學者專家：與政治、經濟、社會或其他各類任職於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臺灣教授與研究人員等。

4. 中國大陸學者專家：與政治、經濟、社會或其他各類任

職於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中國大陸教授與研究人員等。

5. 臺灣工商企業團體：臺灣工商企業界之公司經營者、管理人和從業人員等。

6. 中國大陸工商企業團體：中國大陸工商企業界之公司經營者、管理人和從業人員等。

7. 社會民間團體：關注社會相關之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工（協）會等。

8. 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行為者：指跨國性的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東協、歐盟與其他世界各國政府等。

9. 其他：無法歸到上述分類者。

10. 無任何消息來源。

新聞報導立場

亞投行新聞報導之報導立場包括：（1）支持或鼓吹加入之正面立場；（2）反對加入或懷疑其效益之負面立場；及（3）僅針對該議題進行一般性描述的中立立場。

新聞報導框架

新聞報導內容框架的類目建構的部分，本文參考張裕亮（2011、2012）、張錦華（2011）及張家琪（2012）並加上研究者閱讀所有亞投行之新聞報導，將新聞報導框架分為以下幾類：（1）促進臺灣經濟發展框架；（2）協助臺灣參與區域經貿框架；（3）中華文化歷史與文明框架；（4）國家主權競爭框架；（5）決策與民主程序框架；（6）中國崛起國家安全框架；（7）美日中亞太地緣競爭框架；（8）各類社會議題框架；（9）促進臺灣與臺商產業轉型框架；（10）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紅利框架；（11）中國區域經貿角色框架；（12）亞投行負面效應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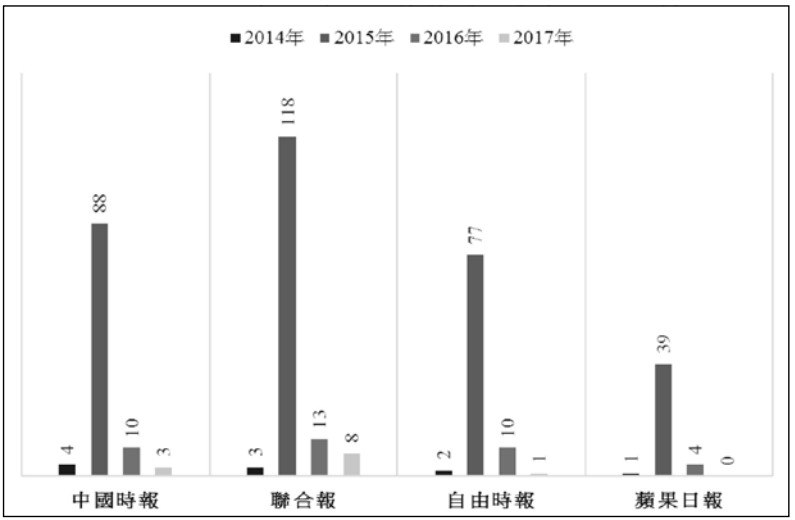
五　資料分析與發現

1　各報報導新聞則數比較

從圖 1 可知，四大報報導亞投行則數在不同年度的變化與趨勢。總體來說，從 2014 年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四大報共報導了 381 則有關於亞投行之新聞。由於 2014 年 10 月亞投行成立備忘錄才簽署，因此與亞投行相關的新聞報導內容在 2014 年才陸續出現，但相關的報導則數並不多，四大報 2014 年有關亞投行的報導則數分別為：《中國時報》4 篇、《聯合報》3 篇、《自由時報》2 篇與《蘋果日報》1 篇。另外，從報導內容進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看，2014 年各報針對亞投行所進行的報導多是以說明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籌立等相關事宜之介紹性新聞。例如《中國時報》第一篇以亞投行為標題的新聞出現在 2014 年 11 月 7 日，當時《中國時報》以「習近平推亞投行　串連絲路國家」為題，針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相關成立事宜進行報導；《聯合報》第一篇以亞投行為標題的新聞報導則出現在 2014 年 11 月 14 日，當時新聞標題為「亞投行……廿一國來標會」，來說明亞投行當時的籌建情形以及各國的反應。《自由時報》第一篇以亞投行為標題的新聞報導則在 2014 年 10 月 25 日就已出現，該文標題為「亞投行成立　日韓澳印尼缺席」，《自由時報》的新聞內容不僅說明了當時亞投行的相關發展，亦着重凸顯日韓澳等國缺席的消息。《蘋果日報》以亞投行為標題所進行的第一篇新聞報導出現在 2014 年 10 月 24 日，並以「參與 AIIB　南韓突然翻臉縮手」為題來進行報導，與《自由時報》較為類似的是，《蘋果日報》除了報導亞投行的發展外，也凸顯了未參與國家的相關立場。

2015 年是各大報報導亞投行議題之高峰期，《中國時報》

圖 1：2014-2017 年四大報報導亞投行新聞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報導了 88 則，佔該報報導總數的 83%；《聯合報》則報導了 118 則，亦佔該報報導總則數的 83%；《自由時報》則在 2015 年針對亞投行議題進行了 77 則的新聞報導，該年度佔《自由時報》總報導則數的 85%；《蘋果日報》則在 2015 年針對亞投行議題進行了 39 則的報導，該年度的報導數量更是佔《蘋果日報》總報導則數的 88%。由上述可見，2015 年是各報報導亞投行議題的高峰期，但當臺灣於 2015 年 4 月得知無法成為亞投行之創始會員國，且兩岸也未能在參與身份、參與方式與會員權利等問題上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臺灣四大報針對亞投行的新聞報導數量在 2015 年達到高峰之後，旋即快速下滑。2016 年時四大報報導亞投行的則數分別為《中國時報》10 則、《聯合報》13 則、《自由時報》10 則與《蘋果日報》4 則。另外，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中國時報》以亞投行為標題所進行的新聞報導僅剩 3 則、《聯合報》8 則、《自由時報》1 則，而《蘋果

日報》則未以亞投行為標題進行任何的新聞報導。由上述討論可知，臺灣四大報以亞投行為標題所進行的新聞報導以 2015 年為高峰，隨後由於兩岸未能在臺灣參與亞投行的名稱、形式與權利等問題上達成共識，致使四大報針對亞投行議題所進行的新聞報導則數，到了 2016 和 2017 年後快速減少下滑。

2 各報報導主題內容比較

四大報報導主題內容的比較方面，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significant difference），卡方檢定數值為 $\chi 2(18, 381) = 55.78, p < .001$。換句話說，四大報針對亞投行進行的新聞報導所着重的主題內容有統計上的顯著差

表 1：各報報導主題內容交叉分析

			報紙來源				總計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主題內容	國家主權議題	計數	43	42	26	10	121
		百分比	40.6%	30.0%	28.6%	22.7%	31.8%
	經濟貿易議題	計數	21	33	18	12	84
		百分比	19.8%	23.6%	19.8%	27.3%	22.0%
	民主政治議題	計數	1	1	10	1	13
		百分比	0.9%	0.7%	11.0%	2.3%	3.4%
	文化交流議題	計數	0	0	0	1	1
		百分比	0.0%	0.0%	0.0%	2.3%	0.3%
	國際關係議題	計數	39	61	37	16	153
		百分比	36.8%	43.6%	40.7%	36.4%	40.2%
	社會民生議題	計數	0	2	0	4	6
		百分比	0.0%	1.4%	0.0%	9.1%	1.6%
	其他主題議題	計數	2	1	0	0	3
		百分比	1.9%	0.7%	0.0%	0.0%	0.8%
總計		計數	106	140	91	44	381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18, 381) = 55.78, p < .001$

異；進一步地檢視主題內容的差異可知，四大報在國家主權議題、經濟貿易議題、文化交流議題、國際關係議題及其他主題之主題內容的報導並未有顯著差異。

然而，四大報針對民主政治議題與社會民生議題的報導則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自由時報》針對民主政治議題的報導顯著地高於《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但和《蘋果日報》並無顯著差異。另外，《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針對民主政治議題所進行的報導與《蘋果日報》相比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由於民主政治議題並非《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所着重的報導主題，因此在這三份報紙中，該議題的佔比較小，而彼此的報導差異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相較之下可知，四大報中《自由時報》針對此議題最為關注。另外，四大報在社會民生議題上的報導亦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蘋果日報》針對該議題的報導顯著地高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和《聯合報》。另外，由於《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針對該議題所進行的報導則數佔比較小，因此三者間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由此可知，《蘋果日報》報導較多地關注於社會民生議題，對於亞投行可能造成的社會民生各項議題投注了較多的關心。

由四大報之報導主題內容的比較分析可知，四大報針對國家主權議題、經濟貿易議題、文化交流議題、國際關係議題及其他主題之新聞報導上並未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自由時報》在上述報導議題外，特別關注民主政治議題的相關報導，而《蘋果日報》則相對較為關注社會民生議題。

另外，針對《自由時報》報導與民主政治相關之新聞內容進行論述分析可知，《自由時報》特別關注與該議題相關之民主程序問題。其中在 2015 年《自由時報》77 篇以亞投行為標題的新聞報導內容中，與「民主程序」相關的報導內容出現的

次數就達 30 次，可見《自由時報》在報導亞投行相關議題時，多是從民主程序的角度進行報導。例如，2015 年 4 月 15 日，《自由時報》在報導臺灣是否應以增資方式爭取加入亞投行時，即談論到了臺灣政府內部相關民主決策程序的問題，報導內容指出：「……若臺灣確認能在尊嚴、公平下參與亞投行……，臺灣可能會投入二億美元；之後再有增資的過程，還須經國會的預算程序，接受國會監督……。」又如 2015 年 4 月 4 日，報導馬英九政府加入亞投行之決策過程時，其新聞內容指出：「……馬政府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決策過程與程序，引發高度爭議，學生團體還到總統府前抗議……。」再如 2015 年 3 月 31 日新聞報導寫道：「……臺灣參加亞投行是少數人做出的決策，行政機關一意孤行，其利弊得失未向全民說明，也沒有經過國會監督，完全違反程序正義……。」從《自由時報》有關於民主政治議題之新聞內容論述分析可知，《自由時報》在報導該類議題時，其所着重的報導重點在於臺灣加入亞投行的政府決策程序，以及因着決策程序而來的民主政治議題。另一方面，《蘋果日報》針對亞投行的新聞報導內容中，較其他報紙更重視社會民生議題，而其所關注的社會民生焦點則是放置在兩岸交流過程中所可能產生和引發的社會利益分配問題。例如《蘋果日報》2015 年 5 月 12 日的新聞報導中提到：「……有尊嚴、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且對國際社會貢獻力量、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是臺灣人民的共同主張，呼籲北京應尊重臺灣的民意與期望，莫讓臺灣社會加深對兩岸交流利益分配問題產生負面觀感……。」另外，2015 年 4 月 2 日的報導中再次論及：「……民間反對聲浪不小，主要在強調：1，未經國會討論通過，就貿然申請，等於藐視國會。2，沒有向社會充分說明，該如何讓兩岸互動所帶來的好處在社會上有更公平的分配效果……。」由此可知，《蘋果日報》針

對亞投行議題所進行之新聞報導內容，着重在論述兩岸關係交流之社會分配是否公平之社會民生議題上。

總體而言，從報導內容主題的比較和分析可知，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時，國家主權議題、經濟貿易議題、文化交流議題、國際關係議題等皆是四大報共同所關注的基本議題。但相對下，《自由時報》較其他三報較着重於民主政治議題的論述和報導，其中政府的決策過程與民主程序議題是《自由時報》在亞投行議題報導時所側重的報導重點。另外，《蘋果日報》則較其他報紙更重視社會民生議題之報導，而其報導之重點則側重於兩岸交流之社會利益分配問題。

3 各報報導消息來源比較

經由比較各報報導之消息來源後發現，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議題時，彼此之新聞來源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卡方檢定值為 $\chi 2(24, 381) = 92.1, p < .001$。

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新聞時之消息來源在臺灣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中國大陸學者專家、臺灣工商企業團體、中國大陸工商企業團體及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行為者等消息來源上彼此之間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臺灣政府單位、官員與政治人物是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議題時最常引用的消息來源，其次則是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行為者為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議題時次常用的消息來源。進一步來看，四大報在引述中國大陸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的消息來源時，臺灣學者專家和社會民間團體之新聞消息來源引用上有所差異。其中，《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新聞報導中，以中國大陸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為消息來源顯著地低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以臺灣學者專家作為新聞報導之消息來源方面，《自由

表 2：各報報導消息來源交叉分析

			報紙來源				總計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消息來源	臺灣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	計數	28	43	28	16	115
		百分比	26.4%	30.7%	30.8%	36.4%	30.2%
	中國大陸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	計數	34	25	3	2	64
		百分比	32.1%	17.9%	3.3%	4.5%	16.8%
	臺灣學者專家	計數	12	24	25	4	65
		百分比	11.3%	17.1%	27.5%	9.1%	17.1%
	中國大陸學者專家	計數	3	4	0	0	7
		百分比	2.8%	2.9%	0.0%	0.0%	1.8%
	臺灣工商企業團體	計數	0	0	0	2	2
		百分比	0.0%	0.0%	0.0%	4.5%	0.5%
	中國大陸工商企業團體	計數	0	1	0	0	1
		百分比	0.0%	0.7%	0.0%	0.0%	0.3%
	社會民間團體	計數	0	0	11	4	15
		百分比	0.0%	0.0%	12.1%	9.1%	3.9%
	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行為者	計數	28	43	24	16	111
		百分比	26.4%	30.7%	26.4%	36.4%	29.1%
	其他	計數	1	0	0	0	1
		百分比	0.9%	0.0%	0.0%	0.0%	0.3%
總計		計數	106	140	91	44	381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 2(24, 381) = 92.1, p < .001$

時報》則顯著高於《中國時報》；另一方面，《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在引用社會民間團體之消息作為新聞報導之來源亦顯著高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而《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彼此則未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皆是屬於較常引用社會民間團體之訊息作為其新聞報導之消息來源。

4 各報報導新聞立場比較

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時，其報導立場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卡方檢定值為 $\chi 2(6, 381) = 231.24, p < .001$。換句話說，不同報紙在報導亞投行時其所採取的報導立場有所差異。其中，《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較常以正面立場之報導方式進行報導，且顯著地高於《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而《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之間則未有顯著差異。另外，《自由時報》多以負面立場進行亞投行之新聞報導，且其負面立場之報導顯著地高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蘋果日報》，而《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則較少使用負面立場進行報導，且兩者的差異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與《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自由時報》相比，《蘋果日報》最常使用的報導策略是以中立立場來進行報導。因此，由上述討論可知，總體而言，《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較常使用正面立場作為其報導策略，《自由時報》則多以負面立場來進行報導，而《蘋果日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時則多採取中立之報導立場。

表 3：各報報導新聞立場交叉分析

			報紙來源				總計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報導立場	正面立場	計數	63	73	1	3	140
		百分比	59.4%	52.1%	1.1%	6.8%	36.7%
	負面立場	計數	0	5	63	8	76
		百分比	0.0%	3.6%	69.2%	18.2%	19.9%
	中立立場	計數	43	62	27	33	165
		百分比	40.6%	44.3%	29.7%	75.0%	43.3%
總計		計數	106	140	91	44	381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 2(6, 381) = 231.24, p < .001$

5 各報報導新聞框架比較

四大報在 12 項新聞報導框架方面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卡方檢定值為 $\chi 2(33, 381) = 170.52, p < .001$。換句話說，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時其所運用的新聞報導框架有所不同，且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表 4　各報報導新聞框架交叉分析

			報紙來源				總計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報導框架	促進臺灣經濟發展框架	計數	4	13	0	2	19
		百分比	3.8%	9.3%	0.0%	4.5%	5.0%
	協助臺灣參與區域經貿框架	計數	40	22	0_c	2	64
		百分比	37.7%	15.7%	0.0%	4.5%	16.8%
	中華文化歷史與文明框架	計數	0	1	0	0	1
		百分比	0.0%	0.7%	0.0%	0.0%	0.3%
	國家主權競爭框架	計數	6	27	30	7	70
		百分比	5.7%	19.3%	33.0%	15.9%	18.4%
	決策與民主程序框架	計數	2	2	12	3	19
		百分比	1.9%	1.4%	13.2%	6.8%	5.0%
	中國崛起國家安全框架	計數	0	0	1	0	1
		百分比	0.0%	0.0%	1.1%	0.0%	0.3%
	美日中亞太地緣競爭框架	計數	17	26	18	11	72
		百分比	16.0%	18.6%	19.8%	25.0%	18.9%
	各類社會議題框架	計數	0	2	2	4	8
		百分比	0.0%	1.4%	2.2%	9.1%	2.1%
	促進臺灣與臺商產業轉型框架	計數	1	7	0	0	8
		百分比	0.9%	5.0%	0.0%	0.0%	2.1%
	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紅利框架	計數	17	9	0	3	29
		百分比	16.0%	6.4%	0.0%	6.8%	7.6%
	中國區域經貿角色框架	計數	18	30	14	9	71
		百分比	17.0%	21.4%	15.4%	20.5%	18.6%
	亞投行負面效應框架	計數	1	1	14	3	19
		百分比	0.9%	0.7%	15.4%	6.8%	5.0%
總計		計數	106	140	91	44	381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 2(33, 381) = 170.52, p < .001$

在 12 項的新聞報導框架中，有 5 項新聞報導框架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分別為中華文化歷史與文明框架、中國崛起國家安全框架、美日中亞太地緣競爭框架、促進臺灣與臺商產業轉型框架和中國區域經貿角色框架。其中，中華文化歷史與文明框架、中國崛起國家安全框架與促進臺灣與臺商產業轉型框架並非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時之重點報導框架，且四大報在此 3 類新聞框架的報導差異情形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另外 2 項新聞報導框架亦未達統計顯著差異的，分別是美日中亞太地緣競爭框架和中國區域經貿角色框架，但與上述不同的是，這兩項新聞報導框架是四大報時常使用的報導框架。由於亞投行的成立是依循着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而來，因此四大報在報導此議題時，時常從美中日地緣政治與權力競爭的面向切入進行報導；類似地，亦是由於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倡議影響並改變了中國大陸在當前區域經貿的角色，因此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之議題時，亦時常運用該新聞報導框架來進行報導。

另外 7 項新聞報導框架中，則展現出了四大報不同的新聞框架報導策略。在促進臺灣經濟發展框架方面，《自由時報》顯著地低於《聯合報》，且在四大報中以《聯合報》最常使用該新聞報導框架來進行亞投行新聞議題之報導，而《自由時報》則幾乎不使用該新聞報導框架來報導亞投行之新聞。在協助臺灣參與區域經貿框架方面，《聯合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皆顯著地低於《中國時報》，而《自由時報》亦顯著地低於《聯合報》；在該新聞報導框架中，最常運用此框架來進行新聞報導的報紙分別為《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蘋果日報》，而《自由時報》則幾乎不使用該報導框架來報導亞投行之新聞。從上述兩項新聞報導框架來看，《自由時報》最不認同臺灣加入亞投行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協助臺灣參與區域經貿的論述

觀點。國家主權競爭框架方面，《自由時報》對於運用該類框架報導亞投行的新聞顯著高於《中國時報》，尤有甚者，《自由時報》是四大報中最常運用此類型之新聞媒體，而《中國時報》則是四報中最少使用者。在決策與民主程序框架方面，如上所述，《自由時報》最常運用該類型之報導框架，在此類框架中《自由時報》所着重的是政府在參與亞投行之決策過程是否符合民主程序等議題，而《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運用決策與民主程序框架顯著高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社會議題框架方面，《聯合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間的差異未達統計的顯著性，但《蘋果日報》對於社會議題框架的報導卻顯著地高於《中國時報》，且如上所述，《蘋果日報》較其他報更關注於兩岸交流與合作所可能帶來的社會效應與分配問題。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紅利框架方面，《自由時報》在其新聞報導中，幾乎未使用此類型框架來進行報導，《自由時報》在此報導框架上亦顯著地低於其他三報。在不認同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所可能帶來紅利的觀點下，《自由時報》則更多地着重在加入亞投行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之報導，且其顯著地高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

6 臺灣四大報針對亞投行新聞報導中的「理性」與「感性」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臺灣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議題時之「理性」和「感性」的論述軸線，研究者以「理性、利益、認同與臺灣人」作為為理性和感性的關鍵字，計算 2014-2017 年間，四大報在進行亞投行新聞報導時之理性與感性的思維軸線，以及以此四個關鍵字作為代表在新聞報導中所出現的次數，藉以進一步了解各報彼此之間在亞投行新聞報導的論述內涵差異。由表 5 可知，臺灣四大報報導亞投行議題時所使用之

「理性」與「感性」關鍵詞在卡方分析上達到統計的顯著差異，卡方檢定值為 $\chi 2(9, 190) = 21.57, p < .05$。換句話說，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時其所使用的「理性」與「感性」關鍵詞有所不同，且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表 5　各報新聞報導內容中「理性」與「感性」關鍵詞之使用

			報紙來源				總計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報導詞彙	理性	計數	6	8	1	0	15
		報紙來源 內的 %	12.2%	12.5%	1.8%	0.0%	7.9%
	利益	計數	37	49	40	19	145
		報紙來源 內的 %	75.5%	76.6%	71.4%	90.5%	76.3%
	認同	計數	2	2	0	1	5
		報紙來源 內的 %	4.1%	3.1%	0.0%	4.8%	2.6%
	臺灣人	計數	4	5	15	1	25
		報紙來源 內的 %	8.2%	7.8%	26.8%	4.8%	13.2%
總計		計數	49	64	56	21	190
		報紙來源 內的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 2(9, 190) = 21.57, p < .05$

總體來看，各報在報導亞投行之議題時，「利益」皆是各報在報導時所使用的關鍵詞彙，雖然各個報紙在運用利益為關鍵詞彙進行該議題之報導時，所着重的部分可能有所差異，但總體而言各報在針對亞投行進行新聞報導時，超過七成五的比例會探討與利益相關的主題和論述。這樣的發現與石之瑜（1994）的看法類似，臺灣四大報主流媒體在報導與國家利益和兩岸關係相關之議題時，多是以現實之利益觀點為主要出發點來進行報導。另外，四大報在具有認同意涵之「臺灣人」為關鍵詞的使用上，則有着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總體而言，《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在報導亞投行之議題時，並不經常使

用和探討有關臺灣人和其相關之認同議題，然而，《自由時報》在進行相關報導時，其使用臺灣人為關鍵詞之報導內容與次數顯著地高於其他三大報。若進一步地檢視《自由時報》是如何使用臺灣人之關鍵字在亞投行之新聞報導內容時可發現，《自由時報》常使用「出賣、受害、尊嚴、情感、覺醒、情緒等」富有情緒性之話語，藉以陳述其與認同相關之論述，一方面清楚地表達該報對於臺灣加入亞投行的反對立場，另一方面，也透過上述具有情緒性與認同傾向之關鍵詞的運用，進一步地將亞投行議題與臺灣人之情感與認同加以連結。例如《自由時報》於 2015 年 4 月 3 日的社論中如此說道：「……亞投行對我國的商機微不足道……若馬政府執意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參加就等於向國際公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且踐踏民主價值，出賣臺灣人民利益……臺灣人民還要繼續飼這樣的老鼠嗎。」又如，《自由時報》於 2015 年 4 月 17 日的社論中如此表示：「……宣稱加入亞投行『有利兩岸關係』、『是 FTA（自由貿易協定）的敲門磚』，顯然拿五年前的 ECFA 說辭，企圖再次行騙已覺醒的臺灣人民……。」

由上述之分析可知，臺灣四大報針對亞投行之新聞報導內容依舊是延續着「利益」與「認同」的雙線性思維。利益是佔據各大報報導亞投行時最主要所使用的新聞關鍵字，而臺灣人和其相關具有情緒性和認同意涵的字詞，亦高度地出現在《自由時報》在報導亞投行之相關新聞內容中。而本文的研究發現，也與當前許多發現類似，例如林瓊珠、洪煒婷（2009）分析《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及《自由時報》民意論壇中有關兩岸關係之論壇意見後發現，由於臺灣民眾對於此三大報之統獨政治立場有着基本的認識，因此臺灣民眾在進行讀者投書時，亦會基於其自身之統獨立場和身份認同來決定其有關於兩岸關係之言論要投稿至哪一家報紙中。該文研究發現，《自由時報》

較願意接受和刊登在兩岸關係立場中偏向獨立立場的讀者投書，《聯合報》則較願意接受和刊登在兩岸關係立場中偏向統一立場的讀者投書，而《中國時報》的立場則居於兩者之中。另外，蕭怡靖（2006）研究發現，讀者與報社本身的政黨與政治立場彼此相互影響。一般來說，《自由時報》的政黨立場較偏向泛綠政黨，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政黨立場則較偏向泛藍政黨，相對下《蘋果日報》的政黨偏向較不明顯。另外，由於各報在新聞報導時所持之不同的政黨立場與認同上的差異，亦進一步地影響到其所吸引的閱聽人背景；順此，該文研究發現，《自由時報》讀者較為支持泛綠政黨，且在政治與身份認同上較認同臺灣獨立及臺灣人之身份認同，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讀者群的背景則相反，其政治立場上較傾向支持泛藍政黨，且在兩岸關係之議題與身份認同方面則較支持兩岸統一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因長期報紙統獨立場的差異，確實也影響到閱聽人對於兩岸關係議題立場和國家利益概念之判斷。對此，劉嘉薇研究認為，臺灣民眾之報紙媒體選擇與其統獨立場間有因果關係，換句話說，一方面報紙媒體所傳播的新聞內容對閱聽人的統獨立場有所影響、另一方面劉嘉薇也指出，閱聽人的統獨立場是會改變的，透過吸收媒體所傳遞的政治資訊和新聞內容，將會進一步地影響到閱聽人對於兩岸關係之統獨立場、身份認同以及對於何謂國家利益的看法。由此可見，臺灣報紙新聞媒體對於民眾之統獨立場、身份認同與國家利益等議題的建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劉嘉薇，2016）。

總體而言，從上述本文的分析可知，臺灣四大報針對亞投行之新聞報導框架與報導策略與過往的報導方式類似，亦即當臺灣四大報在報導與兩岸關係有關之新聞時，《自由時報》常以反對、負向與富有情感之感性認同報導框架來進行相關新聞

內容之報導，相反地，《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則常以支持、正向與經濟效益之理性自利框架來報導與兩岸關係有關之新聞內容，再次，由於《蘋果日報》的報紙屬性並非着重在報導硬性新聞（hard news），因此當《蘋果日報》在進行兩岸關係議題之報導時，則較能顯現出其與其他三大報相比之下較為客觀和中立的報導立場。換句話說，臺灣四大報無論是過去在報導兩岸相關之新聞議題或現在報導亞投行之議題，依舊延續着「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二線思維上，受到臺灣四大報如此之二線式報導框架的影響，以及如上所述臺灣民眾會循着自己不同之政黨傾向與身份認同而選擇閱讀特定報紙，致使得這種「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報導框架深深地影響到個別報紙之閱聽大眾，並且逐漸地在閱聽人的認知與思維上產生預示效果。當個別之閱聽人原本就因為本身之政黨傾向和身份認同而選擇閱讀特定報導或新聞媒體後，此類報紙與新聞媒體之報導框架又會反過來強化閱聽人本身之既定立場與認同傾向，以及其對於兩岸關係議題之態度與看法。換句話說，臺灣民眾既有之政黨傾向與身份認同，以及其所選擇閱讀之報紙和媒體的報導框架之間本來就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因果關係，這種個人政治傾向和立場與媒體選擇的因果關係，可能使得臺灣民眾在新聞報紙閱讀行為和新聞訊息的來源的選擇行為越來越固定，使其對於特定新聞議題之立場有可能越來越和其閱讀報紙之報導框架相似。在受到新聞報紙報導框架的影響下，閱聽人對於某個特定的新聞（如兩岸關係）議題之立場和態度即已被事先建立，待下一次遇到相同或類似之新聞議題時，閱聽人即便在尚未清楚議題之來龍去脈和內容時，其立場與態度因早已被既有之新聞報導框架所影響，使得閱聽人將跟隨着既有之記憶與立場作為針對下一個新聞議題判別的標準。

對此，臺灣新聞媒體對於兩岸關係相關之新聞報導內容一

方面受到臺灣整體社會對於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議題之氛圍所影響，另一方面，臺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之態度與認同立場亦受到媒體新聞報導之框架所影響。這種相互影響的關係依然還是奠基在「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雙線思維架構下。Lin（2013）分析了 1996 至 2010 年間，臺灣社會對於兩岸關係政策所出現之「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互動情形。Lin 發現從 1996 至 2010 年間，臺灣社會的理性與感性互動關係共出現過四次循環，而在每次的循環中，臺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政府之兩岸關係政策，皆受到當時臺灣社會和民眾對於自身身份認同所影響。長期以來，臺灣社會與新聞媒體的報導皆存在着如上所述之「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二線思維上的拉扯，而這樣的拉扯一方面使得臺灣在面對與中國大陸有關之議題時立場與政策顯得搖擺不定，另一方面，臺灣社會與民眾長時間陷入在兩岸關係議題之理性與感性的拉扯與詰抗，亦不利於臺灣社會的穩定以及凝聚對於兩岸關係議題之共識。有鑑於臺灣社會內部長期以來在兩岸關係之議題時所面對之理性與感性的矛盾與拉扯，以及隨着中國大陸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其可能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等各領域擴展其影響力的情況下，臺灣社會似乎需要有別於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以外的兩岸關係論述。對此，本文以文化和文明的角度試圖開創另一種兩岸關係論述的可能，一方面希冀透過文明與文化論述的建立突破臺灣社會內部長期以來所陷入在理性與感性二線思維的困境，另一方面，本文亦希望透過文明觀點之兩岸關係論述的建構，建立一個可以為臺灣社會與國家帶來更多利益的可能性論述。

六　兩岸關係從文明觀點出發之可能性

面對臺灣社會內部長期以來針對兩岸關係議題陷入在理

性與感性之矛盾中，本文認為臺灣似乎可嘗試跳脫理性與感性的思維軸線，並以「文明或人類文明」的觀點重新塑造臺灣的國家利益以及兩岸關係論述。由於長期以來報紙在統獨立場上的差異，不利於凝聚臺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議題中何謂國家利益之共識，對此本文認為，臺灣社會內部長期以來少從「文明或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論述兩岸關係和國家利益，但這卻是中國大陸在其一帶一路倡議和建立亞投行上之重要國家利益論述。張志銘、湯名暉認為：「……中國大陸當局希望『一帶一路』是以中華文化為核心所推動的一次文明型崛起，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文化符碼進行再脈絡化……並且將『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設立視為是國際公共財的概念，但中國大陸不是單一的供給者，也希望邀集其他沿線國家加入開發行列，共享文明再造之可能榮景。」（張志銘、湯名暉，2017）中國大陸希望透過文明符碼的再建構來淡化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崛起可能會帶來威脅的看法，並沖淡國際地緣政治中傳統以霸權和權力競爭觀點之論述。對此，Gal 認為吾人必須跳開傳統地緣政治或現實主義之權力觀點，而應從文化與文明符碼的觀點來理解當前中國大陸所提出來之相關論述，各國當可從文明的角度重新定義各個國家在此議題上的國家利益與優先順序，藉以從絲路文明再建構的過程中，獲取不同國家的國家利益（Gal，2016）。但從本文的分析發現，各報運用「中華文化歷史與文明框架」進行新聞報導之比例皆不到 1%，使得臺灣缺少從文化乃至於人類文明的宏觀視野來論述兩岸關係和國家利益視野的切入點。對此，臺灣若能從共享人類文明的論點以及絲路文明的再建構的觀點出發，即可有助於突破當前兩岸關係論述與新聞報導框架中的「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之二線思維的矛盾與拉扯。

另一方面，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欲透過其一帶一路的推動與亞投行的建立，一方面協助一帶一路延線國

家興建相關之基礎建設，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希望自己能夠在此過程中成為國際公共財的提供者，在創造與推進人類文明生活的期許下，中華民國（臺灣）沒有理由在如此富有高度價值與意涵的倡議中被排除在外。因此，本文認為若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彼此承認、平等交往、理解溝通和優勢互補」等原則來和沿線國家交往，也期待在這個過程中降低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大陸權力興起的憂慮，並進一步地促使自己成為國際公共財之提供者，那麼在推進人類文明如此之大的願景下，怎麼能夠排除臺灣和中國大陸一起為創建更好的世界之權利呢？在這樣的期許下，臺灣與中國大陸事實上有許多可以合作並推進人類文明的方式。在推進人類文明的前提下，兩岸即可適時地跳脫傳統上對於主權議題的爭論，而中國大陸亦可展現其為崛起大國的氣度與風範。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大陸以及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在區域乃至於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臺灣社會當前這種擺盪於理性和認同間之國家利益界定困境，需要另一種論述與解釋作為突破當前困境的觀點。本文認為以人類文明為基礎，在「以人為本、共同合作、促進文明、利益共享、責任分擔」等有利於人類社會和文明發展的目標下，一方面作為尋求兩岸進一步合作之可能，另一方面，臺灣亦可從此論點上進行思考與申論，藉此突破困擾臺灣社會已久之理性自利和感性認同的二線思維與拉扯，並藉此尋求可為中華民國（臺灣）創造最大國家利益空間的論述與觀點（林育任，2014）。

七　結論與討論

亞投行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下所設立之跨洲國際金融組織，面對國際社會多國參與的情形，臺灣是否參與不僅成為

了國內社會和政壇重要的爭論議題，而其爭論的背後也代表了不同的國家利益觀點和立場。然而，有鑑於大眾傳播媒體在國家利益和輿論形塑上的影響力，本文選擇臺灣四大報為研究對象，藉以了解臺灣四大報是如何報導亞投行以及亞投行新聞議題如何再現於新聞報紙上。對此，以下為本文針對四大報亞投行新聞進行內容分析後所歸納之各報報導特徵：

表 6：四大報報導亞投行新聞之報導特徵

各報報導新聞則數比較	各報針對亞投行的新聞報導皆始於 2014 年，且在 2015 年達到報導高峰；但由於後續兩岸無法在臺灣參與亞投行之名稱、形式與權益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因此相關之新聞報導於 2016 和 2017 年快速下滑減少。
各報報導主題內容比較	各報針對國家主權議題、經濟貿易議題、文化交流議題、國際關係議題及其他主題之主題內容的新聞報導上，並未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自由時報》特別關注民主政治議題的相關報導，而《蘋果日報》則相對較為關注社會民生議題。
各報報導消息來源比較	各報在報導亞投行新聞時之消息來源在臺灣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中國大陸學者專家、臺灣工商企業團體、中國大陸工商企業團體及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行為者等消息來源上，彼此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四大報在中國大陸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臺灣學者專家和社會民間團體之新聞消息來源引用上有所差異。
各報報導新聞立場比較	總體而言，《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較常使用正面立場作為其報導策略，《自由時報》則多以負面立場來進行報導，而《蘋果日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時則多採取中立之報導立場。
各報報導新聞框架比較	在 12 項的新聞報導框架中，有 5 項新聞報導框架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分別為中華文化歷史與文明框架、中國崛起國家安全框架、美日中亞太地緣競爭框架、促進臺灣與臺商產業轉型框架和中國區域經貿角色框架。另外 7 項新聞報導框架中，則展現出了四大報不同的新聞框架報導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文的分析已進一步地回答了本文所欲回答的五項研究問題。首先，從表 6 可知，臺灣四大報在報導亞投行之新聞議題時，無論是在報導立場、新聞內容、引述觀點以及報導框架

等項目上，都表現出不同的新聞報導內容與策略。然而本文認為，臺灣四大報對於亞投行之新聞報導內容，還是依循着傳統臺灣社會對於兩岸關係議題之「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二線思維與拉扯。在受到四大報不同之新聞報導框架的影響下，閱聽人對於兩岸關係議題或國家利益相關之議題，早已有了既定的立場和態度；換句話說，媒體報導之新聞框架，已逐漸地在閱聽人和臺灣社會民眾之心中產生預示效果，此種效果不僅局限了民眾對於類似議題進一步討論和思考的空間，也限制了臺灣社會與政治精英得以跳脫出理性與感性二線思維並建構出第三條論述路線的可能。對此，本文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倡議，兩岸應當從以促進人類文明發展之高度出發，並在「以人為本、共同合作、促進文明、利益共享、責任分擔」等有利於人類社會和文明發展的目標下尋求兩岸共同合作的可能。另外，臺灣方面亦可由共創人類文明的角度，藉以建構政治分歧度較低，且亦可突破當前臺灣社會在面對兩岸關係議題時所時常陷入之「理性自利」和「感性認同」二線思維模的困境，從中建立可為兩岸和人類社會帶來更多益處的政治論述和國家利益觀點。

參考文獻

中央社（2015）：〈經部報告：進亞投行有評估美日關係〉，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4020116-1.aspx，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9 日。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一帶一路是適應新常態的重大戰略舉措〉，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slzf/Document/1441137/1441137.htm，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3 日。

王石番（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獅。

王毓莉（2005）：〈中國大陸駐點臺灣記者新聞報導之研究：以《新華社》與

《人民日報》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頁 1-41。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15）：〈2015 年臺灣媒體白皮書〉，http://www.maataipei.org/upload/1432174866.pdf，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4 日。
臺灣指標民調（2015）：〈臺灣民心動態調查、亞投行與兩岸民調〉，http://www.taiwansecurity.org/files/archive/344_91132a5d.pdf，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4 日。
石之瑜（1994）：〈誰的新聞自由？誰的國家安全？——兩岸關係中的媒體與敵意〉，《臺大新聞論壇》，第 1 卷，第 2 期，頁 29-47。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1）：《網路新聞群組與政策議題形成互動之研究》，台北：秀威。
吳乃德（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臺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臺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頁 5 - 39。
周子欽（2014）：〈「亞洲基建投資銀行」倡議簡析〉，http://www.ctasc.org.tw/02publication/APEC-175-p06-07.pdf，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13 日。
林育任（2014）：〈以人類發展概念構思兩岸關係發展的新思維初探〉，《發展與前瞻學報》，第 4 期，頁 21-44。
林瓊珠、洪煒婷（2009）：〈報紙民意論壇在兩岸關係立場之內容分析〉，《選舉評論》，第 7 期，頁 22-44。
林顯明（2015）：《大數據時代：你不知道的 ECFA：再解構兩岸關係中的 ECFA 政策論述》，台北：致知學術出版。
林顯明（2017）：〈九二共識的變遷與延續：從新制度主義到論述制度論的觀點解析〉，《國家發展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頁 101-152。
邱素津、趙永祥（2016）：〈從「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分析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之挑戰與效益〉，《華人經濟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頁 81-102。
耿曙（2009）：〈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頁 1-32。
張志銘、湯名暉（2017）：〈「一帶一路」的發軔：隱喻式的國家發展策略初探〉，《國家發展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頁 43-100。
張家琪（2012）：《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國家形象塑造的媒體因素之研究——以《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對中國大陸國家形象建構為例（1999-2009）》，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裕亮（2011）：〈市場至上或全民利益？——旺旺中時媒體報導兩岸及大陸

新聞的角色爭辯研究成果報告〉，http://nhuir.nhu.edu.tw/bitstream/987654321/7379/1/992410H343026.pdf，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13 日。

張裕亮（2012）：〈和則兩利——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兩岸及大陸新聞報導〉，《傳播與管理研究》，第 42 期，頁 55-82。

張錦華（2012）：〈從 van Dijk 操控論述觀點分析中國大陸省市採購團的新聞置入及報導框架：以臺灣四家報紙為例〉，《中華傳播學刊》，第 20 期，頁 65-93。

陳映男、耿曙、陳陸輝（2015）：〈依違於大我、小我之間：解讀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的心理糾結〉，《臺灣政治學刊》，第 20 卷，第 1 期，頁 1-58。

陳祥、陳嘉珮（2009）：〈臺灣國家形象轉變 20 年（1986-2005）——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形塑下的臺灣〉，《傳播與管理研究》，第 9 卷，第 1 期，頁 5-31。

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臺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2 期，頁 87-125。

陳敦源、呂季蓉、孫玟秀（2014）：〈是誰告訴人民政府表現如何？政府績效、公共資訊、與外電新聞的守門人之研究〉，《文官制度季刊》，第 6 卷，第 1 期，頁 1-53。

曾于蓁（2015）：〈大陸對臺農漁採購政策變化：「契作」機制及其效果〉，《問題與研究》，第 54 卷，第 1 期，頁 95-128。

楊慧娟（2010）：〈媒體報導大陸富豪團在臺灣行程的論述分析——《聯合報》、《自由時報》和《中國時報》為例〉，《立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頁 81 - 99。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劉嘉薇（2016）：《臺灣民眾的媒體選擇與統獨立場》，台北：五南。

蕭怡靖（2006）：〈臺灣閱報民眾的人口結構及政治態度之變遷——1992 至 2004 年〉，《臺灣民主季刊》，第 3 卷，第 4 期，頁 37-70。

Adoni, H. & Mane, A.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1, No. 3, pp. 323-340.

An, S., K. & Gower, K., K. (2005), “How do the news media frame crisi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risis news coverag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No. 35, pp. 107-112.

Boukes, M., Boomgaarden, H. G., Moorman, M. & Vreese, C. H. (2015), "Political News with a Personal Touch: How Human Interest Framing Indirectly Affects Policy Attitud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92, No. 1, pp. 121–141.

Bryant, J. & Miron, D. (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4, No. 4, pp. 662-704.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4, pp. 51-58.

Gal, L. (2016), "China's Infrastructure Play: Why Washington Should Accept the New Silk Road,"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china-s-infrastructure-play, accessed date: 27th October, 2017.

Goffman, E. & Berger, B. (2000),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ortheaster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Iyengar, S. (2005), "Speaking of Values: The Framing of American Politics," https://pcl.stanford.edu/common/docs/research/iyengar/2005/speaking.pdf, accessed date: 27th October, 2017.

Keng, S., Tseng, J. Y.-C., & Yu, Q. (2017),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Charm Offensiv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a Southern Taiwan Town under Attack from Chinese Economic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32, pp. 956–981.

Lin, S. S. (2013), "National Identit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aiwan's Cross-Strait Policy: The Case Of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in Weixing Hu (ed.), *New Dynamics in Cross-Taiwan Straits Relations: How Far Can the Rapprochement Go?*. UK: Routledge, pp. 31-46

Scheufele, D. A. & Tewksbury, D. (2007),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7, No. 9, pp. 9-20.

Sears, D. (1993), "Symbolic Politics: A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y t," in William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 pp. 113-149.

Wei, C.-h., & Lai, C. J. (2017), "Identities, Rationality and Taiwan's China Policy:

The Dynamics of Cross-Strait Exchange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pp. 144-148.